政治科學論叢／第 77 期／民國 107 年 9 月／頁 113-140

東亞新興民主國家政黨體系制度化的比較*

魏德榮**

摘　要

本文主要討論議題爲東亞新興民主國家民主化時機與政黨體系制度化之間的關係。多數政黨體系制度化研究者依循著 Huntington 的理論，且研究區域侷限在西歐民主國家，或東歐、拉美等新興民主化國家，只有少數研究著墨於東亞新興民主國家政黨體系制度化的問題。本文根據總體選舉資料與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簡稱 ABS）的調查資料，發現東亞新興民主國家的政黨體系逐漸趨於穩定，政黨存在時間也不斷拉長。但同時，東亞地區公民對政黨的信任卻很低，而且不認爲選舉能提供人民眞正的選擇。所以，即使政黨體系在菁英層次趨於穩定，但這樣的發展並沒有向下和選民建立更強的連結關係。因此政黨體系即使日益穩定，也只能被認爲是「部分制度化」。然而，如何解釋即使政黨和選民之間的連結薄弱，同時選舉結果的可預測性卻升高，且政黨體系趨於穩定？經由研究東亞五個新興民主國家的案例，本文主張東亞國家民主化的時機點，可以解釋爲何政黨和選民之間沒有發展高度的連結。此外，多數決選制的採用，使得即便缺乏政黨與選民高度的連結，也能出現使政黨得票的變動呈現下降的現象。

關鍵詞：政黨、政黨體系制度化、政黨認同、選舉波動、東亞

---

* DOI:10.6166/TJPS.201809_(77).0004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助理教授、臺灣大學東亞中心博士後研究員，E-mail: markweatherall@ntu.edu.tw。

收稿日期：106 年 7 月 24 日；通過日期：107 年 8 月 27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導論

政黨長期以來被認爲攸關民主政治的運作。學者 Diamond (1994: 15) 提到「沒有連貫一致的政黨體系，就沒有穩定的民主」，一語道破政黨體系在民主政治中的關鍵地位。由於對民主政治而言「政黨不可或缺」（Lipset, 2000），民主鞏固和民主深化有賴於一個穩定健全的政黨體系之發展。特別是在東亞社會中，由於民主政治缺乏強健的歷史根源，同時又面臨中國對外輸出的威權主義的挑戰，使得健全穩定的政黨體系更是至關重要。學者用「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這個概念來分析民主國家政黨體系的發展和政黨能否發揮功能的問題。大部分政黨制度化研究者都依循著 Huntington (1968) 的理論，將研究區域集中在西歐民主國家，或者東歐、拉美等新興民主國家。直到近年來，才終於開始有少數學者針對東亞國家政黨體系發展進行研究，他們的研究發現都指出東亞國家政黨體系制度化的不足（Croissant & Völkel, 2012；Hicken & Kuhonta, 2014）。然而，最近幾次東亞新興民主國家的選舉經驗顯示，選民循政黨標籤的投票模式愈趨穩定。例如臺灣和蒙古兩黨競爭體系已經相當穩固，菲律賓在 2013 年和 2016 年兩次選舉，政黨體系已經有一定程度的延續性。在南韓，2016 年之前顯示有相對穩定的兩黨體系，但安哲秀（Ahn Cheol-soo）宣佈成立「人民之黨」（People's Party），並在 2016 年國會選舉中拿到 38 席，成爲第三大黨，打破過去兩黨政治的格局。在印尼，多數小黨已經很難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席次。但東亞新興民主國家政黨體系是否已全面性成熟？那也未必。菲律賓的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從一個局外人（outsiders）一躍成爲總統，將來有可能弱化已經形成的政黨體系。此外，在東亞政黨體系發展的同一時間，西方先進工業國家的政黨體系正在解組和重構（Dalton & Wattenberg, 2000），在其這樣的脈絡下，該如何理解東亞政黨體系的發展？本文補充 Croissant & Völkel (2012) 與 Hicken & Kuhonta (2014) 的研究，主張東亞民主國家的政黨體系制度化可以從菁英（elite）和大眾（mass）層次有不同的發展。東亞民主國家的政黨體系在大眾層次的制度化仍然不足，但在菁英層次本文發現政黨體系有逐漸制度化的趨勢。本文主張，這種「部分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度化」（partial institutionalization）的現象，正與東亞民主化的時機有關。

在概念上，本文修正 Jones (2007) 提出的概念，再經由 Croissant & Völkel (2012) 兩人的修正，討論有關東亞政黨體系制度化的問題。本文將依據此概念，使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簡稱 ABS）第一至四波的調查資料和各國選舉的總體資料，來研究包含南韓、臺灣、蒙古、印尼和菲律賓等東亞新興民主國家。Croissant & Völkel (2012) 認爲，在這 5 個國家中，臺灣、蒙古和印尼政黨體系制度化相對完善，而南韓和菲律賓的發展則尚未成熟（inchoate），不過，這 5 個國家政黨體系制度化均有朝向一致性發展的跡象，即政黨體系逐漸穩定，政黨存在時間也在拉長中。但同時弔詭的是，根據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最近的調查資料顯示，東亞地區公民對政黨的信任較低，而且不認爲選舉提供人民眞正的選擇。因此，本文認爲政黨體系在菁英層次有逐漸制度化，但這樣的發展並沒有和支持者產生更強的連結關係。因此，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在於進一步理解政黨體系的制度化：第一，本文將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研究範疇擴大到東亞新興民主國家，和拉丁美洲或東歐等地區相比，過去東亞地區爲案例研究政黨體系的發展往往被忽略，故本文填補了這些研究的不足。其二，本研究區分政黨體系制度化的兩個層次「菁英和大眾」的差異，並運用這樣的視野來解釋爲何東亞國家政黨體系在變得穩定的同時，一般民眾卻即使有政黨認同也越來越不信任政黨。這樣的發展趨勢可以被形容爲「部份的」（partial）政黨體系制度化，換言之，政黨競爭模式在缺乏政黨和選民之間強聯繫的條件下，只在菁英層次漸趨穩定。第三，本研究探究了各種解釋東亞國家政黨體系發展差異的因果機制，首先在菁英層次上，選舉制度的變革一方面阻礙了來自外部的挑戰，同時也讓政黨競爭「鎖進」（lock in）既有的政黨體系之中，這個結果使得政黨體系即便在政黨不得民眾信賴與支持的情況下，仍呈現逐漸穩定總體趨勢。但另一方面，如同 Mainwaring & Zoco (2007: 171) 所述，由於東亞國家民主化的時間點較晚，政治菁英可以藉由新的管道如大眾傳播媒介接觸選民，繞過政黨組織動員選民，是導致民眾疏離政黨的另一項重要原因。

本研究所涵蓋的 5 個國家皆被自由之家評價爲「選舉民主政體」或「自由民主政體」，象徵這些國家的人民具有一定的政治權力、允許多名候選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或多黨透過自由且公平的選舉角逐政治職位（Freedom House, 2017）。雖然東帝汶和日本皆爲民主國家，前者因缺乏調查資料，後者因實施民主的經驗比較久無法和其他國家作比較，所以排除列入本文的研究對象。至於東亞地區其他非民主國家，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等，也排除在本文的討論中。本文分析的時間，從其第一次舉辦民主選舉（亦即奠基性選舉）到最近一次選舉之間，在此之間，如菲律賓舉辦過 10 次選舉，印尼舉辦過 4 次選舉。本文使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四波資料作爲理論的驗證。該調查第一波在 2001 年執行，第四波在 2016 年完成調查。詳細基本資料如表 1。

表 1　東亞五國背景資料

國　家	研究時期	首次選舉	選舉次數	調查波數	政權類型
臺　灣	1992-2016	1992	8	4	民主
南　韓	1988-2016	1988	8	4	民主
蒙　古	1990-2016	1990	7	4	民主
印　尼	1999-2016	1999	4	3*	民主
菲律賓	1987-2016	1987	10	4	民主

註解：* 印尼並未包含在第一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
資料來源：Freedom House (2017)

貳、測量指標

民主政治需要什麼型態的政黨競爭體系呢？Giovanni Sartori (1984: 47) 認爲，2 個以上政黨相互爭取選民支持以掌握政權，才是眞正民主政治關鍵之所在。但很多新興民主國家至今仍然有很深的民粹主義（populism）傳統，政治強人往往挾民意以自重，或者不顧憲政制度的約束，或者發動軍事政變，或者破壞或者重組政黨（Mainwaring & Scully, 1999: 55）。由於缺乏制度化的政黨競爭體系，因此就出現總統的權力缺乏國會的制衡。O'Donnell (1997: 44-52) 就把這些國家的民主稱爲「委託式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

政治學對於政黨制度化的研究始於 Samuel Huntington，Huntington (1968: 12) 對制度化的定義是：組織獲得價值和穩定的政治過程，可以透過 4 個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向來測量：「適應性（adaptability）、凝聚性（coherence）、複雜性（complexity）和自主性（autonomy）」。Huntington 的研究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在於，他是首位對「制度化」這個概念提出完整定義的人，此外他也區分了測量此概念的各種面向，提供後續研究者一套理論框架與測量指標來瞭解並觀察政黨與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發展。Angelo Panebianco 則是第一個出版有關政黨制度化書籍的學者。1982 年他在義大利出版，1988 年被翻譯成英文：*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Panebianco (1988: 53) 對政黨制度化的定義是：「組織固定化（solidifies）、逐漸失去其作爲工具的特色，而變成更有自己的價值」（“slowly loses its character as a tool” and “becomes valuable in and of itself”）。Levitsky (1998: 78) 則發展另一個研究政黨制度化的面向，以阿根廷的裴隆主義正義黨（Peronist Justicialista Party）作爲基礎，Levitsky 將制度化視爲價值的灌輸（institutionalization as value infusion），以及制度化作爲行爲的慣例（institutionalization as behavioral routinization）分開來討論。除此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著作，Dix (1992) 應用 Huntington 的 4 個制度化面向來測量拉丁美洲政黨的制度化。

Mainwaring & Scully (1995) 兩人不同於早期的研究，過去的研究只關心單一政黨的制度化，Mainwaring & Scully 第一次將分析的焦點轉向政黨體系。然而，如何對政黨和政黨體系制度化的概念操作化，仍然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議題（Yardımcı-Geyikçi, 2013）。政黨體系制度化有很多不同測量面向，很多經驗研究都只使用選票變動性（volatility）作爲政黨體系制度化的討論（Hicken & Kuhota, 2011；Roberts & Wibbels, 1999；Tavits, 2005）。但是，較低的選票變動性也有可能是較弱的政黨體系制度化，尤其在單一制度化執政黨（a single institutionalized ruling party）主導的社會，並避免有意義的選舉競爭。Mainwaring (2014) 指出，在沒有眞正選舉競爭的國家，低變動性可能是缺乏選擇而非實際的制度化。即使在民主國家，低程度的選票變化，也可能是基於一個主導政黨的制度化（面臨其它較弱的制度化競爭，例如日本），或存在兩個以上制度化的政黨（例如美國或英國），但這也可能發生在沒有制度化政黨的國家。低變動性可能形成穩定的選民和單一候選人的侍從主義關係，而較少形成政黨標籤。

因此，要有效測量政黨體系的制度化，需要包含更多變項。Mainwar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Scully (1995) 指出 4 個政黨制度化的面向：「穩定與可預測的政黨競爭」（stable and predictable party competition）、「較強的社會基礎和選民的政黨認同」（strong roots in society and voters show strong identification with parties）、「主要政治人物認可政黨正當性」（major political actors accord legitimacy to parties）和「政黨組織的重要性」（party organizations matter）。在研究拉丁美洲的政黨時，Jones (2007) 依據 Mainwaring & Scully 的架構，提出 4 個政黨體系制度化的面向：黨際競爭模式（patterns of inter-party competition）、政黨的社會基礎（party roots in society）、選舉過程中政黨的正當性（legitimacy of parties in elections），以及政黨組織（party organization），並發展各種指標來測量這些面向。而 Croissant & Völkel (2012) 將這些面向、指標和操作化做了很好的整理，如表 2 所列。

表 2　政黨體系制度化的四個面向

面　　向	指　　標	操　　作　　化
1. 政黨競爭的模式	1.1 投票不穩定性	所有政黨兩次選舉得票率差異的絕對值加總除以二（範圍 0～100）
	1.2 席次不穩定性	將席次同上述處理
2. 政黨的社會基礎	2.1 政黨認同	受訪者認同某個政黨的百分比
	2.2 政黨距離	國會議員（下議院）相信政黨疏遠社會的百分比
3. 政黨的正當性	3.1 政黨的必要性	受訪者同意政黨對於國家運作具有必要性之百分比
	3.2 政黨信賴度	受訪者信賴政黨的百分比
	3.3 公正的選舉	選舉在公正到不公正量表上的等級
	3.4 選舉選擇性	選舉眞正提供候選人之間的選擇
4. 政黨組織	4.1 政黨年齡	政黨成立年數 ≥10 年的百分比（至少取得10% 席次）；政黨成立年數 ≥25 年的百分比（至少取得 10% 席次）
	4.2 政黨連貫性	國會議員認爲其政黨在各次選舉間具有連貫性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Croissant & Völkel (20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roissant & Völkel (2012) 結合上述的測量，最後成爲單一政黨制度化指標（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 Index, PSI）。在這個架構下，政黨競爭越穩定、政黨支持的程度越高、越接受政黨和選舉正當性且政黨存續的時間越久，則政黨體系的制度化程度就越高。相反的，若政黨競爭難以預測，政黨支持的程度越低、人民懷疑政黨的正當性、新政黨頻繁的建立和解散，則政黨體系的制度化程度越弱。本文將透過此架構，研究五個國家跨時間的政黨制度化過程。

參、民主化前後政黨體系的發展

競爭性政黨體系在東亞地區發展的歷史很短。東亞地區最久的政黨—國民黨（KMT，創立於 1912 年，1949 年撤退到臺灣）和蒙古人民黨（MPP，創立於 1921 年，該黨於 1925 年至 2010 年間，曾更名爲蒙古人民革命黨，MPRP），在創立之後便成爲高度制度化的政黨組織，且不允許敵對政黨的成立。相反的，印尼在蘇哈托新秩序口號下，有 2 個官方的反對黨（亦即建設團結黨，PPP；印尼民主黨，PDI）。執政的印度尼西亞黨（Golkar），透過選舉操縱來確保其選舉優勢。南韓在李承晚獨裁統治，和半軍事獨裁的朴正熙與和全斗煥，雖然都允許反對黨運作，但限制反對黨的活動，並藉由操控選舉來確保他們的執政地位不被挑戰。在這 5 個國家中，只有在菲律賓有政黨競爭的歷史，維持兩黨競爭一直到馬可仕 1972 年實施軍事法爲止。

多元開放的政黨競爭模式是不可能在獨裁制度下發展的。然而，除蒙古外，所有國家皆在民主化之前便開始發展政黨體系。在蒙古，民主化之前的選舉，所有候選人要不是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黨員，不然就是得到該黨的背書參選。然而，在獨裁制度下初始的政黨競爭，對民主轉型後的政黨體系演化有相當大的影響。儘管禁止新政黨且停止全國性選舉，臺灣的地方選舉和立法委員補選依然屬於競爭性的選舉。準政黨體系在 1970 年代形成，其反對黨以「黨外後援會」的名義運作。「黨外」這個名稱原本只是指不同反國民黨政治人物的結合，但經過一段時間，黨外組織更加制度化。1986 年黨外的政治人物違反黨禁成立民主進步黨（DPP），從此之後，國民黨領軍的泛藍陣營和民進黨領導的泛綠陣營形成臺灣的兩黨競爭體系。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隨著黨外和民進黨在選舉中的勝利，反對黨的正當性逐漸增加，迫使國家讓步進行民主改革。另外，南韓則有很長的政黨競爭歷史，在民主化之前，破碎的反對黨被迫聯合挑戰李承晚和朴正熙領導下的執政黨。而後民主時期的政黨體系，則由全斗煥的民主正義黨（DJP）挑戰韓國民主黨（DKP）和後來的新韓國民主黨（NKDP）。

不同於臺灣和南韓，在政府的金援下，印尼的反對黨（建設團結黨和印尼民主黨）則相對溫順。他們雖嘗試動員民眾，但也被禁止從地方層級進行組織。政黨需要支持政府的計劃，來作爲他們參與選舉的條件，因此選舉並未提供有意義的選擇，從 1971～1997 年，印度尼西亞黨獲得 60%～70% 的選票。對於政黨競爭的管制意味著反對黨快速被邊緣化。在蘇哈托下台後，數以百計的新政黨，開啓印尼民主改革和轉型的步驟（Tan, 2015: 236-249）。而菲律賓則是另一個不連續轉變的案例，隨著馬可仕的下台，政黨體系包含在政權瓦解前的唯一政黨－親政權的新社會運動（KBL），加上新反對聯盟的組成，包含兩個馬可仕上台前的政黨－國民黨和自由黨（Croissant & Völkel, 2012）。

除了蒙古的單一政黨威權體制之外，有哪些因素可以解釋在臺灣和南韓相對連貫的政黨體系，但在印尼與菲律賓政黨體系卻呈現斷裂式的發展？雖然臺灣和南韓的執政黨在制度化的層次上存有差異，但兩國的相同之處在於，他們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經浮現相對穩定的政治分歧，以作爲政黨政治的基礎。以臺灣爲例，最顯著的政治分歧是族群與國家認同，而南韓民主化前的分歧則是保守與自由陣營的對立與區域主義。反觀印尼與菲律賓，民主化之前並沒有這樣的政治社會分歧，再者，選民和政治菁英的連結主要建立在個人的恩庇侍從關係網絡，因此在後兩個國家中，穩定政治社會分歧的缺乏，不利於政黨體系在民主化與民主轉型前後的連貫發展。

簡言之，民主化後，政黨體系的改變或連續可被分成三個型態。第一種型態爲蒙古，民主化之前的選舉沒有實際的選擇，而民主化後，威權時代的執政黨依然是主要政黨。第二種型態則包含臺灣、韓國，民主化前後的政黨體系有相當程度的連續性，在這些國家威權時期的執政黨和威權時期的反對黨輪流執政。然而，臺灣和韓國的前執政黨有不同的程度的制度化，臺灣的前執政黨高度制度化且滲透國家機器，而南韓的威權時期執政黨則只是政治菁英的工具。第三種型態包含印尼和菲律賓，政黨體系在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主化前後是斷裂的。在菲律賓，民主化造成前執政黨的崩解，而印尼的印度尼西亞黨團黨則在轉型中生存下來，但失去先前的優勢，形成支離破碎的政黨體系。

肆、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程度

如前所述，Jones (2007) 指出測量政黨體系制度化的 4 個面向，包括政黨內競爭、政黨的社會基礎、政黨與選舉的正當性與政黨組織。然而，對於他所提出來的指標，研究者通常缺乏可信的經驗資料，包括政黨距離、政黨不可或缺性和政黨延續性。多數指標可用的資料爲政黨年齡，但這項指標在使用上是受限的，因爲這不能在民主化前後階段間計算政黨體系的「斷裂」（break）。因此，爲了計算民主化後政黨的延續性，本文借用 Hicken (2014: 312) 的指標，測量哪些政黨進入或離開政黨體系。爲避免在單一測量中存在不同指標的問題，本文在每一個面向都僅選擇一項測度。雖然 Croissant & Völkel (2012) 混合每一個面向成爲 PSI 單一面向，然而，本文對 PSI 中不同的面向如何在時間上演化感到質疑，並且，區分不同面向將能夠顯示在東亞新興民主國家中政黨體系更細微的變化。更進一步地，本研究除眞實選舉資料（選舉波動和政黨出生及死亡率）外，更將選舉結果與民意調查資料（受訪者對政黨取向和信任的看法）結合比較。藉由比較調查受訪者的表達和亦即眞實選舉資料之間的差異，能夠更細緻地說明民主化之後，政黨體系制度化的演化模式（詳如表 3）。

在這之中，第一個面向是政黨競爭的模式，以 5 個國家中國會（下議院）選舉的選票波動（Pedersen index）（Pedersen, 1979）來測量，該指標可表示如下：

$$\text{volatility} = \frac{\sum_{i=1}^{n} \left| p_{it} - p_{i(t+1)} \right|}{2}$$

n 代表的是在國會中取得席次的政黨數目、pi 表示政黨的得票率，而 t 和 $t+1$ 爲時間。這個公式使我們可以測量一次選舉到另一次選舉的變化。如果所有選民在選舉間都改變了政黨選擇，則波動度爲 100；但若沒有選民改變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黨選擇，則波動度爲 0。[1] 如同表 4 所表示的，在民主化前後，最低程度的平均波動可以在兩個個案中被發現，即臺灣和南韓。擁有最高波動的則爲菲律賓，其民主化前後的政黨體系呈現高度的破裂性。印尼的政黨體系則在民主化前後呈現某種程度的延續性，而蒙古的威權統治政黨在轉型中也存活下來，顯現出中等程度的波動度。

表 3　測量面向與指標

測量	面　　向	指　　標	操　　作　　化
選舉資料	1. 政黨競爭的模式	得票不穩定性	所有政黨兩次選舉得票率差異的絕對值加總除以二（範圍 0～100）
	2. 政黨組織	加入或離開體制之政黨比率（政黨出生／死亡比率）	在最近國會選舉贏得最少一席，但在前一次國會選舉沒有贏得席次的政黨比率／在前一次國會選舉贏得至少一席，但在最近國會選舉沒有贏得席次的政黨比率
調查資料	3. 政黨的社會基礎	政黨認同	受訪者認同某個政黨的百分比
	4. 政黨的正當性	政黨信任	受訪者表達信任政黨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4　選票的波動

個　案	時　　期	平均變動
臺　灣	1992～2016	15.6
南　韓	1988～2016	23.0
蒙　古	1990～2016	34.3
印　尼	1999～2016	28.9
菲律賓	1987～2016	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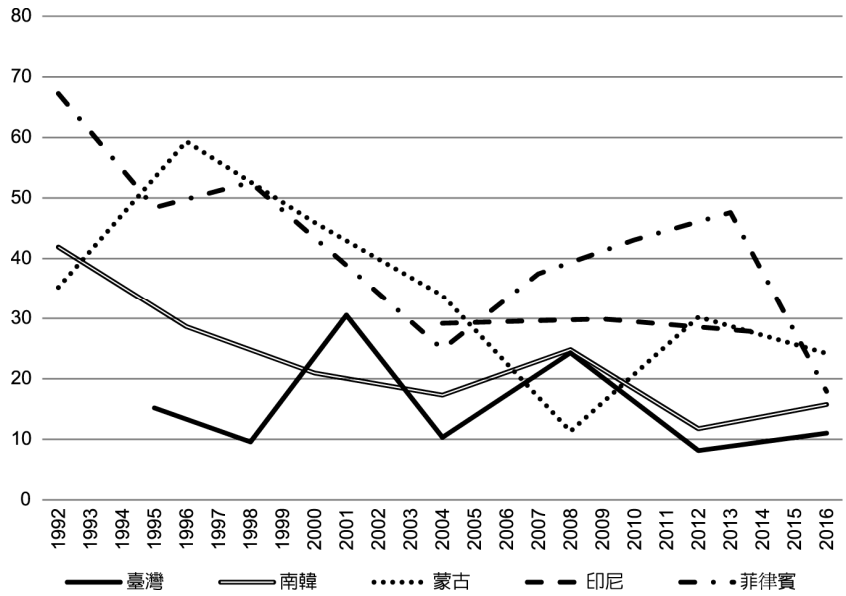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資料庫（2018）；Republic of Korea National Election Commission (2018)；Constituency-Level Elections Archive (2018)；Nohlen et al. (2001)

[1] 在臺灣和南韓，選民雖然會投票支持不同政黨，但基本上鮮少跨過陣營的分野支持不同陣營的黨派（臺灣是泛藍與泛綠；南韓是保守和自由）。儘管如此，在計算政黨選票波動時，本文仍然是以政黨而非陣營來估計選票的變動，其理由在於雖然同陣營的政黨有時會合作協調選區的提名（例如，臺灣泛藍政黨之間的合作），但他們同時也在競爭潛在的同質選民，例如韓國 2017 年選舉，安哲秀和文在寅（Moon Jae-in）都代表自由陣營。選民在兩次選舉投給同一陣營的不同政黨意味他們並未忠誠地支持某一特定政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而，如同圖 1 顯示的，各國政黨得票波動的程度逐漸趨於一致，先前有非常高程度波動的國家（蒙古和菲律賓）和低程度的國家（如臺灣和南韓）的波動逐漸融合在一起。舉例來說，菲律賓在 1992 年波動度有 67.2，但在 2016 年僅有 17.9。同樣地，蒙古的波動度從 59.3 的高峰降到 2016 年的 24.2。和低程度波動的臺灣相較，臺灣 1996 年的波動度爲 15.2，在最近期的選舉中，臺灣的波動度爲 11.0，而印尼爲 27.7，顯示出逐漸降低的跨國差異。總體來說，PSI 的這個面向顯示出逐漸制度化的模式，並伴隨著越來越具可預測性的選舉。這項發現指出，民主化前後政黨體系的延續或破裂作爲選舉波動的決定因素正顯著下降。

圖 1　政黨得票不穩定性趨勢（選區選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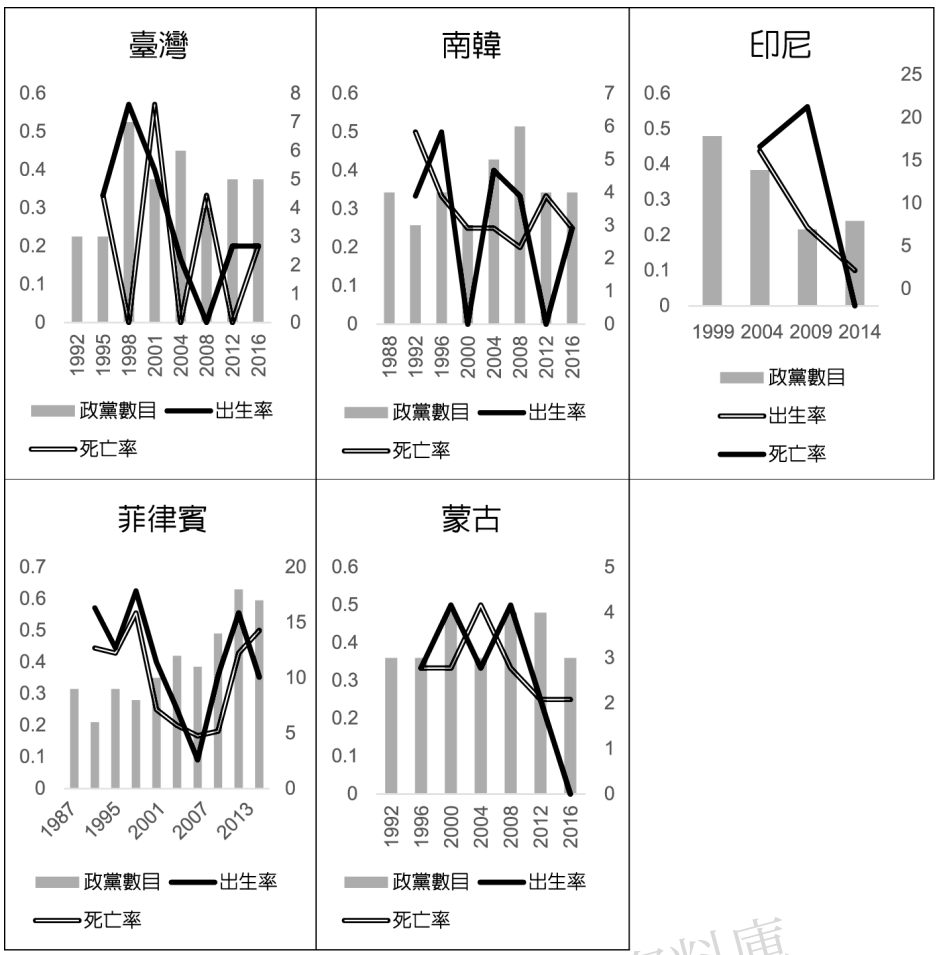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如表 4

第二個面向是測量政黨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圖 2）。「出生率」（birth rate）指的是先前沒有任何國會席次的政黨，在特定一次國會選舉中得到了席次；而「死亡率」（death rate）指的是政黨在先前的國會選舉中都有得到席次，但在特定國會選舉中沒有得到任何席次。舉例來說，出生率 0.25 即表示有 25% 的政黨在先前的選舉中沒有任何席次，但卻在特定選舉中得到至少 1 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席次；而死亡率 0.25 則表示有 25% 的政黨在先前的選舉至少有 1 個席次，但在特定選舉中沒有得到任何席次。爲了方便比較，本文也呈現出國會在每次選舉中有得到席次的政黨數目。政黨出生率和死亡率可以計算政黨進入或離開政黨體系的數目，以測量政黨體系的延續性。政黨出生率和死亡率在歷次選舉之間看似波動顯著；然而，在本文的 5 個研究案例中，有 4 個國家其政黨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有下滑趨勢。唯一例外的是菲律賓，在 2007 年後政黨進入和離開國會的比例則有上升的趨勢。

圖 2　政黨成立及死亡比例



資料來源：如表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臺灣，1998 年後政黨進入數量的成長，來自於一些由國民黨分裂出的新政黨。而在最近的兩次選舉中，也有一些新政黨進入體系。其中，有兩個政黨離開體系的主要時間點，其一爲 2001 年起，臺灣的政黨體系越來越以敵對的「泛藍」和「泛綠」陣營爲競爭中心；其二則爲 2008 年，由於原本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SNTV）的選制改爲有利於大黨的單一選區兩票制，而使政黨數量下滑。總體來說，政黨進入或離開體系的高峰點分別爲 1998 年和 2001 年，在此後便有下滑趨勢。另外，在南韓的例子中，則可看出政黨進入體系比例的尖銳波動。政黨出生率的高峰發生在政黨體系的主要重組期，1996 年是因保守和進步陣營的分裂；2004 年則是因執政的新千年民主黨（MDP）對總統盧武鉉支持與反對的分裂。另外一次新政黨的形成契機爲最近一次的 2016 年國會選舉，主要的自由黨因對文在寅及安哲秀的支持而分裂。雖然進入體系的政黨比例從選舉到選舉間的波動非常尖銳，但總的來說，自民主化後 20 年來，無論是政黨出生率或死亡率整體都呈現下滑的趨勢。

在菲律賓，政黨出生率和死亡率在 2007 年達到最低點。[2] 政黨的波動和死亡率，以及 2007 年後的政黨數目成長顯示出，政黨體系的鞏固（如 2007 年發生在聯盟與反對總統阿奎納之間的選舉）僅僅是短暫的。如同菲律賓，印尼在威權政體下的政黨體系也有明顯破裂，首先是限制對執政黨和 2 個「官方」反對黨的政黨競爭，而後威權時期則是新政黨的出現。1999 年爲第一次民主化後的選舉，有 48 個政黨參與競爭，而 20 個政黨贏得席次。然而，贏得席次的政黨數目在 2005 年爲 16、2009 年爲 9，而 2014 年爲 10。該現象顯示出印尼的政黨體系碎裂化有逐漸減緩的趨勢。此外，政黨出生率和死亡率也在穩定下降，所有在 2009 年選舉贏得席次的政黨，在 2014 年選舉也獲得席次（也就是政黨死亡率＝0）。另外，只有一個在 2009 年沒有席次的新政黨在 2014 年贏得席次。而政黨參與選舉競爭和獲得議席的減少，最主要可歸因於選舉制度的改變，特別是在政治菁英的操弄下，提高了參選政黨的資格限制，並且將當選門檻從原本的 2% 提升到 3.5%（Chen &

[2] 在計算菲律賓政黨出生／死亡率時，本文排除了比例代表制的部分，因爲每個政黨最高可分配 3 席、及限制五大政黨提出比例代表名單的規定無可避免地會形成破碎的政黨體系。鑑於此，在菲律賓的案例中，本文只計算單一選區部分的政黨得票。若要同時考量兩個選舉層級政黨的出生／死亡率，請參考 Hicken (20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riamarizki, 2013）。這些發現都指出，儘管在威權轉型期間，在兩國中都可看到政黨體系的破裂，但印尼的政黨延續性要比菲律賓更大。

相較於上述 4 個國家，蒙古在威權統治下則爲一黨體制，不允許任何的選舉競爭。所有的候選人都是執政的蒙古人民革命黨成員，或由執政黨提名的無黨派成員。民主化後，執政黨在 1990 至 1992 年之間仍維持其優勢地位，直到 1996 年才在反對黨的聯盟後失去國會多數。之後，蒙古逐漸朝穩定的兩黨體系發展，一方爲中間偏左（蒙古人民黨爲代表），而另一方爲中間偏右（民主黨，DP 爲代表）（Gambat, 2004）。自民主化以來，國會裡的政黨數目約在 3 至 4 之間變動（雖然蒙古人民黨和民主黨得到壓倒性的勝利），伴隨著一些小比例的政黨進出。因此，在政黨延續性的面向，蒙古的政黨體系已呈現高度的制度化。

前述制度化的兩個面向捕捉了菁英和大眾行爲的總體效應。舉例來說，選舉中較大的變動性可能爲政治菁英的分裂，也可能是一般選民改變了投票行爲。「政黨死亡」可能是因政治人物決定結束政黨，或者合併入其他政黨；然而，也有可能是因選民拋棄對特定政黨的支持所導致。爲了完整呈現政黨和選民制度化的連結，多數研究在看政黨體系制度化時，會使用調查資料來觀察大眾的政黨取向。在本研究中也將呈現兩種型態的政黨取向：政黨認同以及政黨信任。

在政黨認同的面向，高比例的政黨認同可以在蒙古找到，平均有 84.6% 的受訪者在四波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表示有政黨認同。臺灣、南韓和菲律賓的政黨認同程度則大致相當，僅有近半數受訪者表示有政黨認同（表 5）。最後，最低程度的政黨認同則出現在印尼，此現象可詮釋爲新政權下「低政治化」的官方活動反映。另外，民眾的政黨認同和選舉期間政黨的得票波動兩者之間沒有相關性，舉例來說，蒙古有有相對較高的政黨得票波動和高比例的選民政黨認同；但在相近的政黨認同比例下，菲律賓的政黨得票波動程度卻比臺灣和南韓要高得多。

圖 3 顯示出四波東亞動態調查中民眾政黨認同的變化趨勢。雖然選舉波動程度和政黨出生及死亡率在調查的國家中下滑，民眾擁有政黨認同的程度卻沒有相對應地上升。事實上，在 5 個調查國家中的四國（菲律賓除外），政黨認同還輕微地下降。在菲律賓，四波的資料顯示該國民眾的政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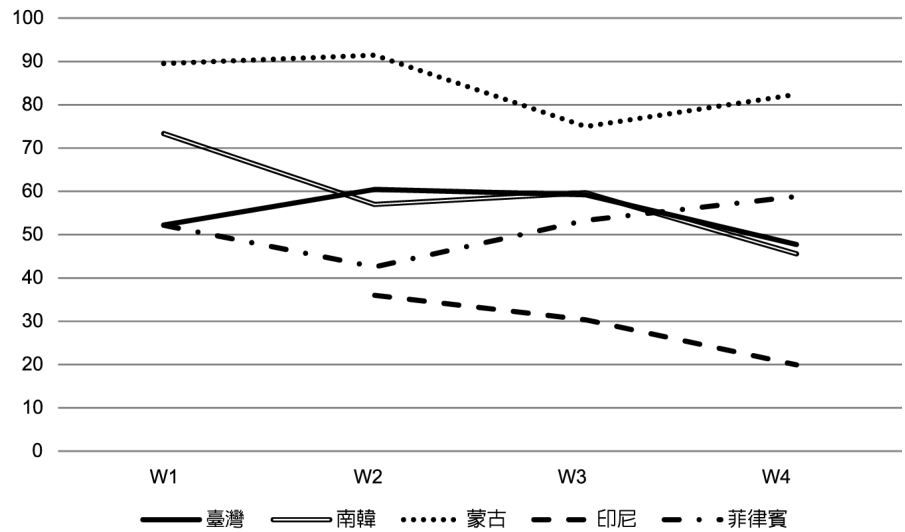
認同微幅上升，並在第四波調查超過南韓和臺灣。總體而言，東亞五國民眾的政黨認同趨勢是下跌的，而這些結果都顯示出，本文在前一節中所提到在東亞國家中逐步上升的選舉預測性，並不是由選民的政黨取向所驅動。

表 5　政黨認同的比率

個　案	調查波數	受訪者認同政黨的百分比
臺　灣	4	54.9
南　韓	4	58.9
蒙　古	4	84.6
印　尼	3	28.8
菲律賓	4	51.7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圖 3　政黨認同趨勢（認同某政黨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最後一個面向是政黨的正當性，本文由受訪者表示對政黨信任的程度來作爲對該面向的測量。而如同表 6 所表示的，在四波調查中政黨信任程度平均最低的國家是臺灣和南韓，但同時，兩國卻也是五國中政黨體系變動最小的。相較之下，其他國家的民眾對政黨的信任更高，如蒙古有 2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菲律賓有 33.8%、而印尼有 44.7%。再者，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政黨的信任程度更遠低於受訪者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這表示民眾對政黨的不信任無法歸咎於對執政菁英的普遍不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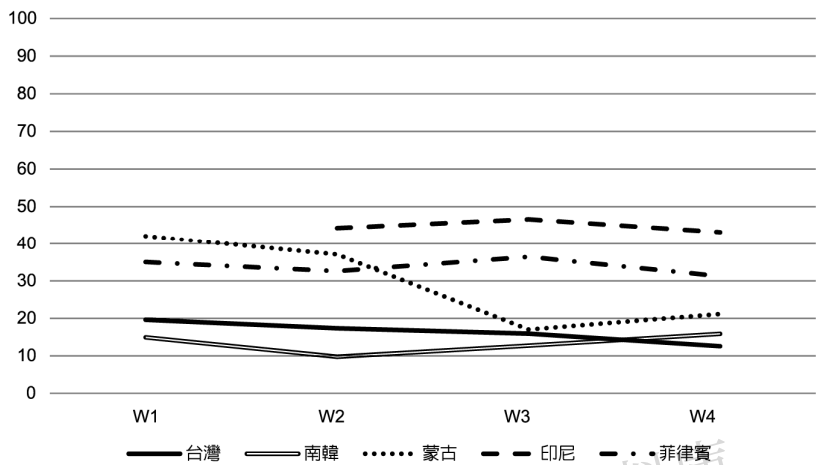
表 6　政黨信任度

個　案	調查波數	平均信任度的百分比
臺　灣	4	16.3
南　韓	4	13.3
蒙　古	4	29.3
印　尼	3	44.7
菲律賓	4	33.8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圖 4 顯示出四波調查中，政黨信任程度的變化趨勢。蒙古的政黨信任程度從第一次調查的 42%，掉到第四波調查的 21%。臺灣和菲律賓在政黨信任上略有下降，而南韓和印尼在四波調查間的政黨信任程度幾乎沒有改變。和政黨認同一起看，似乎沒有證據顯示亞洲的民眾對政黨的信任度正在成長，總體來說，東亞 5 個民主國家民眾對於政黨的信任仍然在低迷的狀態。

圖 4　政黨信任（表達普遍信任政黨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影響政黨體系制度化的因素

以上的選舉和調查數據揭示了東亞政黨系制度化的一些重要趨勢。首先，從選舉競爭格局來看，東亞國家政黨體系傾向制度化。雖然現在說該情形是「一次性」還是長期性的趨勢還爲時尚早，但除了菲律賓之外，其他國家的選舉波動程度都有所下降。此外，如臺灣和南韓此類轉型前後的政黨競爭模式具高度連續性的國家，威權體制留存的政黨競爭對政黨體系的影響似乎正逐漸減弱；而轉型前後政黨競爭高度不連續的國家，如菲律賓和印尼，以及轉型之前不存在有意義的選舉競爭的蒙古，則也趨向於低選舉波動。除了菲律賓由於小型區域性政黨的進出造成政黨體系看似出現重大「流動」之外，其他東亞國家出現政黨存活率和消失率皆下降的趨勢，表明政黨的制度正在變得更加穩定。同時，儘管政黨制度有穩定下來的趨勢，但在此同時，沒有證據表明選民對政黨的情感導向增加。相反地，民眾的政黨認同和對政黨的信任曲線不僅扁平，甚至有所下降。

而既有文獻提出了一些政黨體系制度化的解釋因素。Converse (1969) 首先提出一個時間因素導致民主制度逐漸僵化的模型，基於此邏輯，長期以來慣性的政治的實踐可能會導致選民和政治人物把某些行爲模式規範化，產生更穩定的政黨競爭格局。而除了印度尼西亞在 1988 年民主化後又伴隨蘇哈托政權垮台，本研究中剩下的 4 個案例幾乎在同一時間（1980 年代末或 1990 年代初）進行了民主化，而本文關於政黨得票波動和政黨誕生與消失的數據似乎支持 Converse 的理論－儘管離「僵化」還有段距離，但在這五個案例中，政黨體系都隨著時間的推移趨向更加穩定。

雖然除了印尼之外，本文所研究的其他國家均在同一時間進行了民主化，但若考量專制政權的遺續，則各國之間存在著實質性的差異。Hicken & Kuhonta (2011) 發現，專制政權下的執政黨是高度制度化時，更有可能導致政黨體系制度化。民主化後的初期，曾爲制度化程度高專制政體蒙古和臺灣的政黨體系波動程度低，政黨的進入和退出的水平較低。在臺灣，民主化後的政黨競爭模式相對穩定，也就是國民黨與 1980 年代出現的黨外／民進黨在過渡到民主之前競爭模式的遺留。在韓國，雖然威權政權下的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黨制度化程度低，但是延續了轉型前後的政黨競爭模式，包括金大中和金泳三的反對勢力，分別確立了民主化後的第一個 10 年中更加穩定的投票模式。相比之下，執政黨制度化程度偏低且威權體制前後連續性較低的國家—印尼和（特別是）菲律賓，政黨競爭模式相對不一，政黨的進出頻繁。然而，專制政權的遺續在解釋選民的主觀政黨傾向上似乎不那麼重要，而作爲解釋選舉波動的一個潛在因素，其對於政黨進入／退出的影響似乎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

學理上，政黨制度化和政黨體系制度化是兩個相關但不同的概念。政黨制度化是由 Huntington (1968) 和 Panebianco (1988) 發展的概念，主要將政黨視爲一個組織並聚焦在黨組織的發展。後續的學者如 Mainwaring & Scully (1995) 則將分析的焦點轉移至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發展程度。從因果機制的角度而言，政黨制度化可以被看作是政黨體系制度化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當政治環境限制政黨競爭時，一個制度化的政黨（像臺灣的國民黨）並不會造就一個制度化的政黨體系。但是，一旦民主化開放政黨競爭，原本威權體制下高度制度化的舊執政黨，伴隨著反對黨基於挑戰舊執政黨的需求而快速的組織化，這樣的發展過程便造就了政黨體系制度化的有利條件。換句話說，民主化前威權政黨是否具備組織化和制度化的特徵，這個條件解釋了民主化之後一個國家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程度差異。然而，這個解釋並無法完全解釋南韓的特例，因爲民主化之前南韓並沒有出現一個制度化的執政黨。不過，如前所述，南韓民主化前後連貫的政治分歧與競爭模式的確有利於制度化政黨體系的發展。這個獨特的模式也讓學者描述南韓的案例是「缺乏政黨的政黨體系制度化」（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without parties）（Hellmann, 2014）。

另一組潛在因素涉及國家的憲法和選舉制度。首先，所有研究中的國家都實行總統制（或半總統制）。Linz (1990) 認爲總統制使政治的外部人士更容易贏得行政首長的位置，從而可能破壞政黨制度的穩定。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主流政黨設法將政治外部人士排除於總統職位中，否決了這種潛在的影響。例如，在韓國、臺灣和蒙古，成功的總統候選人總是來自兩個主要黨派之一，由於排除了政治圈的局外人，總統選舉可能通過激發對主要政黨的支持來穩定政黨制度。選舉制度的變化也可能有利於既定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黨，在選舉結果中有更高的穩定性。例如，臺灣在 2005 年憲法改革中以混合比例代表制度取代 SNTV 後，出現較低的選舉波動和政黨進出，此制度傾向多數決並產生更穩定的兩黨競爭。而在印尼，投票權的緊縮以及議會代表的投票門檻增加也有利於既有政黨，降低選舉的波動性和政黨的進出。韓國在 1988 年之前也如上述兩個國家一樣也使用 SNTV 選制，在 1998 年之後由複數選票制轉爲單一選區制，在 2004 年之前，有 20% 左右的議員是以地區選票按比例選舉產生，但在 2004 年改爲兩票制（Croissant, 2002: 245）。但與臺灣和印度尼西亞不同，在韓國，不同的選舉規則不太可能成爲選舉波動下降的因素，是因爲在民主化後的前兩屆選舉中，SNTV 制度就已經傾向於有利兩黨競爭，阻擋小黨進入。

自民主化以來，蒙古的選舉制度經歷了頻繁的變化。蒙古通過了 2012 年選舉的混合名額多數投票制（MMM），取代了以前的多數決制和半比例代表制（Maškarinec, 2017），但是，最高法院於 2016 年 4 月裁定 MMM 違憲，蒙古採取了過去第一個使用的制度，2004 年的蒙古選舉產生了非常不對稱的選舉結果，相較之下，1992 年和 2000 年中的選舉結果更爲對稱（Croissant & Völkel, 2012: 245）。但是，各種類型的多數決選舉制度往往隨著時間的推移產生更可預測的選舉結果，並且大大地阻礙了新政黨進入政黨體系。最後一個案例菲律賓，則是亞洲第一個採用混合制的國家，採開放 80% 的席位與非政黨的 20% 席位不等比例的混合投票制（Reilly, 2007: 1356），儘管構成菲律賓選舉的選民名單元素理論上可能產生更加穩定的政黨競爭，但該國卻經歷了持續高漲的政治波動以及頻繁的政黨進出。2012 年和 2016 年選舉結果的連續性更高，即 Benigno Aquino 的自由黨在每次選舉中都成爲主要政黨，而民粹主義者 Rodrigo Duterte 對選舉波動的影響則還有待觀察。

肆、菁英主導的制度化

從前幾段的分析本文發現，若以選舉波動和政黨進出等面向作爲衡量的基準時，則東亞民主國家的政黨體系似乎正在制度化，但若與調查資料對照，則本文也發現制度化的趨勢並不是從選民的政黨傾向與認同得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個發現也引導出以下的問題，即爲何政黨和選民之間的連結如此薄弱？且同時，選舉結果的可預測性增加且政黨體系看似更加穩定？即如果選民不接觸政黨，那爲什麼政黨標籤在預測選舉結果方面越來越重要，而政黨存在的時間更長？

政治菁英和選民的政治行爲可預測性增加，但政黨與選民間連結變弱，對於這之間存在的分歧，民主化的時間可能是重要解釋因素之一。Mainwaring & Zoco (2007: 171) 認爲，在長期競爭的選舉制度中，政黨有助於塑造公民、建立選舉組織，以建立政黨和選民的連結，而相比之下，新興民主國家的公民較少與政黨連結。新民主國家的政黨參與政黨塑造的動機較少，是因爲大眾媒體和現代競選技巧提供更有效贏得選舉的途徑，而這情況在第一波或第二波浪潮中民主化國家並不存在。此外，儘管民主發展的歷史很短，但該地區的國家並沒有免除如西方國家中所出現的對政治菁英的不滿。在這個意義上，選民的政黨取向脆弱或者對政黨的不信任，可以被視爲對所有政治制度日益憤世嫉俗的一部分。

然而，在政黨制度化研究中，選民和政黨的連結被視爲關鍵組成部分。例如，Mainwaring & Scully (1995) 認爲在制度化的政黨體系中，「政黨深植於社會上之中，且選民對政黨有強烈的認同」。然而，在東亞民主國家，儘管政黨與社會連結較弱、政黨認同程度低，政黨體系仍持續制度化。這表示政黨的制度化可能主要侷限於政治菁英，沒有擴大到政黨和社會的連結。菁英層面的制度化可以通過選舉改革（鎖進主要政黨統治地位）或者利用國家資源（包括侍從主義）保護在任者等措施來實踐，儘管政黨和社會之間的連結趨弱或依舊微弱，但仍然形成更加穩定的政治競爭格局。

過去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相關文獻中，制度化往往被視爲是透過觀察不同面向反映出的單一變數。後續研究者也大多沿用類似的方式，將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程度操作化爲一個綜合各面向的單一指標，據此解釋不同國家政黨體系制度化的差異。然而，本研究主張政黨體系制度化在不同的面向上的發展並不相同，舉例而言，本研究發現在東亞新興民主國家中政黨選舉期間的得票變動有下降的趨勢，亦即政黨體系日益鞏固；於此同時，本文也發現選民的政黨認同有弱化的現象。這意味著研究者應該關注的是，不同變因如政治分歧、歷史遺緒、憲政制度等，對於一個國家政黨體系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度化在不同面向上的異質效果，而非僅將政黨體系視爲單一變數，檢視各種因素如何對之產生影響。舉例來說，選舉制度採用多數決制理論上應該降低政黨得票波動和政黨的進入和退出率，因爲這種選制不但有利於既有的大黨，較高的當選門檻同時阻礙小黨或新政黨的進入。儘管如此，選舉制度改革也可能對民眾的政黨認同或對政黨的信任沒有任何效果。民主化的時機可能是一個關鍵因素，如 Mainwaring & Zoco (2007: 171) 的觀察，較晚民主化的國家，政黨可能較無動機與社會發展牢固的連結，因爲他們可以利用大眾媒體和現代競選技巧與選民接觸。另外，政治菁英持續依賴威權時期所發展的恩庇侍從關係網絡的條件下與選民接觸。這兩種繞過傳統黨組織直接動員選民的模式可能會被強化。

這種菁英主導的制度化在實踐上如何觀察？在有意識形態分歧的兩個國家－臺灣和南韓－選民傾向認同某個政治同盟或陣營（臺灣的藍綠，南韓的自由保守）。在這兩個案例中，政治分歧與國家的外部環境息息相關。舉例來說，臺灣的分歧源自於國家認同與臺灣如何面對中國崛起。而南韓的自由保守兩大陣營的區別，也和他們對北韓採取何種政策相關。然而，儘管社會上存在這些分歧，選民仍然經常在相同陣營內支持不同的政黨。因此本文要論述的是政黨選票波動減緩的趨勢並非肇因於選民對於單一政黨的忠誠（民眾政黨認同事實上在降低），對於這個現象較佳的解釋是政治菁英層次的變化，包括像是臺灣在 2008 年將選舉制度從 SNTV 制改爲混合制，在南韓政治菁英和政黨分裂減緩的長期趨勢。在同一時期，兩個國家的公民社會蓬勃發展，爲政治參與另闢蹊徑。公民社會興起並取代政黨組織動員，就如同於 2008 年南韓反對美國牛肉進口的大規模社會運動（Oh, 2012），以及臺灣 2014 年的太陽花運動（Fell, 2017）。政黨無論是在提供政治參與途徑上或滲透公民社會組織（這些組織逐漸維持其獨立性）的失敗，顯示政黨和選民的連結、及政黨滲透社會的能力仍然相對薄弱。而在蒙古雖然形成了穩定的兩黨體系，但實際上兩大黨在意識形態的分歧上卻趨於同化（Khurts, 2017），儘管傳統上兩大黨具有對立的意識形態歷史遺緒－蒙古人民黨是過去統治的馬克斯列寧政黨，反對黨民主黨則是中間偏右。同時，蒙古的領先者當選（FPTP）選制提高了新政黨進入政治的門檻，將其政黨體系鎖進目前的兩黨體制（Maškarinec, 20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後，菲律賓和印尼的政黨體系是多黨制且充斥恩庇政治。菲律賓民眾的政黨認同從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第二波調查後確實小幅上升，但是印尼大眾的政黨認同卻不斷下滑。對於政黨的信任在兩個國家中也降低。與此同時，本文也觀察到這兩個國家政黨的選票波動程度在減緩（菲律賓是本研究涵蓋的五國中政黨選波動降幅最大的國家）。在同一時期，印尼政黨進出政黨體系的頻率也急遽下滑，而菲律賓最初也出現了類似的下降。在印尼，因爲選舉制度的改變，特別是參選資格的限制和當選門檻的提升，使得政黨投入選舉的難度增加，最後導致參選政黨數下降，這也和本文提出的菁英主導的制度化不謀而合。在菲律賓，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的選制（佔80% 的國會議席）也可以解釋下降的政黨得票波動。然而，2007 年後政黨出生／死亡率的上升，則是肇因於政治聯盟的分裂。就結果而言，這再次顯示菁英主導的制度化並不總是單向的。

伍、結論

本研究探討東亞五個民主國家的政黨體系制度化模式，而從本文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發現，該制度化現象並沒有單一的方向，而有明顯的混合（mixed）特性。首先，雖然政治菁英與一般民眾的政治行爲越來越具有可預測性，但卻未發現相對應的政黨和民眾連結增強的趨勢。事實上，這證明了即便民眾的政黨認同薄弱，且普通選民對政黨的信任不斷下降，這些國家的政黨體系反而變得更加穩定。換句話說，在東亞新興民主國家中，政黨體系的制度化只能被形容爲「部分制度化」，因爲它在各種制度化的面向的發展並不一致，而該結果對於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研究有諸多影響。由於所謂的政黨體系制度化並非是在所有的面向上呈現均等的同步發展。因此，分別探討政黨體系制度化的各個面向，以及導致不同面向發展差異的肇因，要比將政黨體系制度化視爲單一指標變數，對於類似主題的研究更有幫助。舉例而言，在東亞國家中，民主化時間點的遠近可以解釋政黨和選民之間弱連結關係以及選民對於政黨的低度信任，然而政治菁英能夠運用其他的管道動員選民，或通過選舉制度改革等措施來鎖進在位者的權力，並在缺乏政黨與選民的連結條件下，形成相對穩定的政治競爭模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後，本研究對於東亞新興民主國家的重要性在於，雖然這 5 個研究案例中不約而同地出現政黨競爭模式與政黨體系的穩定發展趨勢，但是衰微的政黨認同以及對政黨的不信任並不利於民主體制的正常發展，其中最具威脅的就是群眾運用體制外的方式來表達不滿。例如臺灣 2014 年的太陽花運動，學生抗議者採用體制外佔領立法院的方式來反對與中國的服貿協議，便是一例。此外，對政黨政治絕望也可能讓民粹主義或反建制的勢力獲得發展的機會，菲律賓民粹強人杜特蒂即是最佳寫照。而衰退的政黨認同和政黨信賴同樣也威脅整個政治體系的正當性，這反映在不斷下降的投票率上。然而，政黨是民眾參與政治和表達意見的重要管道，倘若政黨無法有效地運作此功能，民主政體的表現與民主的可持續性勢必將面臨嚴重的挑戰。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中央選舉委員會，2018，〈選舉資料庫〉，中選會資料庫網站，http://db.cec.gov.tw/，2018/08/29。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2018. “Xuanju Ziliao Ku” [Election database]. in http://db.cec.gov.tw/. Latest update 29 August 2018.

二、西文部分

Chen, J. & A. Priamarizki. 2013. “Indonesia’s Democratic Evolution: Political Engineering Post-Reformasi.” in http://www.css.ethz.ch/en/services/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publication.html/171693. Last update 17 September 2018.

Constituency-Level Elections Archive (CLEA). 2018. “Constituency-Level Elections Archive.” in http://www.electiondataarchive.org/. Latest update 29 August 2018.

Converse, P. E. 1969. “Of Time and Partisan Stabilit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2): 139-171.

Croissant, A. 2002. “Electoral Politics in South Korea.” In *Electoral Politics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eds. Aurel Croissant, Marei John & Friedrich-Ebert-Stiftung. Singapore: Friedrich Ebert Foundation, 233-276.

Croissant, A. & P. Völkel. 2012. “Party System Types and Party Syste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stitutionalization: Comparing New Democrac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Party Politics* 18(2): 235-265.

Dalton, R. J. & M. P. Wattenberg, eds. 2000. *Parties without Partisans: Politic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iamond, L. J. 1994.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5(3): 4-17.

Dix, R. H. 1992.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4(4): 488-511.

Fell, D., ed. 2017. *Taiwan's Social Movements under Ma Ying-Jeou: From the Wild Strawberries to the Sunflower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Freedom House. 2017.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7." in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H_FIW_2017_Report_Final.pdf. Latest update 17 September 2018.

Gambat, D. 2004. "The Mass Public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in Mongolia. (Asian Barometer Working Papers, Taipei)." in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publications/7788a3a7459a1cd2ee77a28dcea0c64e.pdf. Latest update 17 September 2018.

Hellmann, O. 2014.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Without Parties: Evidence from Kore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4(1): 53-84.

Hicken, A. 2014. "Party and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In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Asia: Democracies, Autocracies, and the Shadows of the Past*, eds. Allen Hicken & Erik Martinez Kuhont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7-327.

Hicken, A. & E. M. Kuhonta, eds. 2014.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Asia: Democracies, Autocracies, and the Shadows of the Pas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cken, A. & E. M. Kuhonta. 2011. "Shadows From the Past: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Asi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4(5): 572-597.

Huntington, S. P.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ones, M. 2007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Symposium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April 5-6, Denton, Texas.

Khurts, N. 2017. "A Nation Dominated by Cadre Parties (The UB Post. Jul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8).” in https://www.pressreader.com/mongolia/the-ub-post/20170703/281689729833099. Latest update 17 September 2018.

Levitsky, S. 1998.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eronism The Concept, the Case and the Case for Unpacking the Concept.” *Party Politics* 4(1): 77-92.

Linz, J. J. 1990. “The Virtues of Parliamentar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84-91.

Lipset, S. M. 2000.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Political Part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1(1): 48-55.

Mainwaring, S. 2014.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Reflections Based on the Asian Cases.” In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Asia*: Democracies, Autocracies, and the Shadows of the Post, eds. Allen Hicken & Erik Martinez Kuhont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6-348.

Mainwaring, S. & E. Zoco. 2007. “Political Sequences and the Stabilization of Interparty Competition Electoral Volatility in Old and New Democracies.” *Party Politics* 13(2): 155-178.

Mainwaring, S., & T. R. Scully, eds. 1995. *Build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škarinec, P. 2017. “The 2016 Electoral Reform in Mongolia: From Mixed System and Multiparty Competition to FPTP and One-Party Dominance.”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53(4): 511-531.

Nohlen, D., F. Grotz, & C. Hartmann, eds. 2001. *Election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 Data Handbook: Volume II: South East Asia, East Asia, and the South Pacif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Donnell, G. 1997. “Illusions about Consolidation.” in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 Themes and Perspectives*, eds. 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Yun-han Chu, & Mao Hung.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40-57.

Oh, J. S. 2012. “Strong State and Strong C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South Korea: Challenges to Democratic Governance.” Asian Survey 52(3): 528-549.

Panebianco, A. 1988.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Trans. Marc Silv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dersen, M. N. 1979. “The Dynamics of European Party Systems: Changing Patterns of Electoral Volatil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7(1): 1-26.

Reilly, B. 2007. “Democratization and Electoral Reform in the Asia-Pacifi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g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0(11): 1350-1371.

Republic of Korea National Election Commission. 2018. "Republic of Korea National Election Commission." in http://www.nec.go.kr/engvote_2013/main/main.jsp. Latest update 29 August 2018.

Roberts, K. M. & E. Wibbels. 1999. "Party Systems and Electoral Volatility in Latin America: A Test of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3): 575-590.

Sartori, G. 1984.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n, P. J. 2015. "Explaining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Indonesia." In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Asia: Democracies, Autocracies, and the Shadows of the Past*, eds. Allen Hicken & Erik Martinez.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9-73.

Tavits, M. 2005. "The Development of Stable Party Support: Electoral Dynam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2): 283-298.

Yardımcı-Geyikçi, Şebnem. 2013. "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urkey and South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arty Politics* 21(4): 527-5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omparing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East Asia's New Democracies *

*Mark Weatherall***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rty systems in new democracies in East Asi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late democratization. Following Samuel Huntington's work on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studies on party and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However, these studies have been largely focused on Western countries as well as emerging democraci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only a few studies have looked at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East Asia. This study uses election data as well as survey data from the 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 to explore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e region's new democrac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party systems in East Asia are increasingly stable and parties are surviving for longer. However, East Asians have low levels of trust in parties and do not believe that elections offer voters a genuine choice. In other words, although party systems in new democracies in the region are increasingly stable at the elite level, this development has not corresponded with a strengthening of links between parties and voters. Therefor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increasing stability of party systems in East Asia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partial institutionalization." How can we explain the increasing predictability of elections that is happening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continued weakness of linkages between parties and voters? The five cases in

* DOI:10.6166/TJPS.201809_(77).0004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Fellow, Center for East Asia Democratic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markweatherall@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late democratization can explain why parties have not developed strong linkages with vot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adoption of majoritarian electoral systems can explain declining electoral volatility despite the absence of strong party-voter linkages.

Keywords: Parties,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zation, Party Identification, Electoral Volatility, East Asi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